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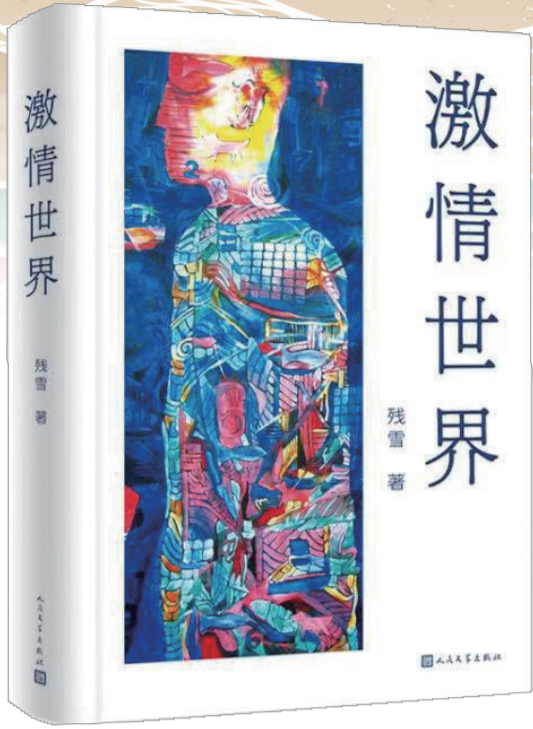
■ 聚焦

以言立象

——残雪文学的哲学解读 □邓晓芒 任雯

残雪最新长篇小说《激情世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访谈邀请哲学家邓晓芒、就残雪的创作实践与哲学内涵等问题答问。其中提到,残雪作为一个“新实验文学”的底层作家,将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融为一体,在最平凡的生活里寻求最美的文学理想,以中西杂糅的纯净的现代汉语表达着中国传统的物性隐喻。

——编者



任雯:作家何立伟曾说,全世界读懂残雪的人,只有一个半。其中一个就是残雪自己,半个是您。您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邓晓芒:我对残雪小说的阅读之所以能够初入门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是从哲学理解进入残雪的文本的,而残雪的文本本身就带有极浓厚的哲学含义,没有一定的哲学修养是进不去的。也许这个评价需要修改的是,即便残雪本人对自己作品的理解也是一个过程,她自己就常把写作当作一条自我探索和自我认识之路,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懂”的。

任雯:生活中的残雪和我们小说中读到的作者形象相近吗?您认为残雪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她的自我的化身吗?为什么?

邓晓芒:应当说,残雪在生活中的形象和小说中的作家形象是非常一致的,因为她的写作就是她的日常生活,例如,她可以随时放下手头的写作而处理日常事务,然后又继续写作,不需要任何过渡;而她的日常生活在她心目中是具有文学性的。当然,如果你把两者从外部形象上强行分割开来,感觉一个生意人(裁缝)与一个作家无法联系起来,你就不可能理解这种一致性。但残雪真的是一个底层的作家,即便成了作家仍然是底层的。她不但善于描写底层小人物的形象和心里,而且颇为欣赏这些形象和心里,因为不论多么低俗平常,她都从中看出了某种高级的、属于全人类的多么心灵图案。

任雯:残雪近两年集中出了两个短篇集《少年鼓手》和《西双版纳的女神》,每一个故事都像是一个绮丽神秘的梦境,出现其中的人物职业、身份、趣味每篇都很不一样,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有共通性,这种共通性造就了她短篇小说的独特气韵,您认为她的短篇小说最独特之处有哪些?这反映了残雪创作上怎样的美学观和哲学观?

邓晓芒:这两本书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一个主题:寻根。但与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热”不同,这里的寻根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像《少年鼓手》中那样为过去举行葬礼,并借此“找出活下去的理由”。路先生是在50年后返回老家去寻找当年关于少年鼓手的美好记忆,最终通过参加已成为葬礼策划人的前鼓手芦先生所操办的葬礼而沟通了生死两界,并借此跨越了人与人的界限。他感到这位芦哥“就是我自己”,对少年鼓手的记忆“就是我自己的记忆”,“两个就是一个”。寻根的结果是,从人类记忆的连贯性来看,全人类也都是“一个”。寻根不是寻找某种特色,而是寻求一种共同人性,并将其融合于任何特色之中,这就是残雪的寻根与所有其他寻根派的作者都不同的地方。

《西双版纳的女神》中的昭则试图到这片神奇的热土去寻找生活的原生态,从一开始很不适应地过于旺盛的“地气”,忍受不了那份至沓来的蚊虫蚂蚁的攻击,只好从平房搬到25层高楼上去。但这样一来,他又因远离了地气和低层住户而感到寂寞,不由得怀念起原来住的平房来。可是这时平房里已住进了一位带着一头凶猛黑熊的神秘女士,这位叫“密蒙”的女英雄,尽管受到众人的关注和窥视,却很少露面,出来也总是戴着黑色面罩。人们说她带来了某种“杀气”,也就是对于原生态“地气”的否定。这引起了昭则的好奇,并感到自己已被带入了“另外一种地气”。正是这另外一种地气不但使昭则心驰神往,也使那些习惯于“夜游活动”的男人趋之若鹜。但当他们夜里终于到达那间屋子时,发现这间屋子里的女神早已不知去向,只有那只黑熊在为失去女神而哭泣。这时昭才开始怀念起那些当初被他嫌弃的小动物们来。经过一番追求,他也和邻居文山一样,适应了这里的地气,成为了地道的“西双版纳人”。整篇小说可以看作残雪文学理念的一个隐喻,从当年的“寻根”到对理想的追求,最后发现这理想其实就扎根于原始的地气之中;但又只有通过否定这种地气,从高处回顾自己的出发点,才能悟到西双版纳蕴藏在地气之中的真正的文学之美。

本报讯 一个村庄的文化自信,将会为整个乡村的全面振兴提供发展路径、内在动能和精神力量。1月18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湖南省作协主办,作家出版社、《十月》杂志社、岳阳市作协协办的彭东明长篇小说《坪上村传》研讨会,在线上相结合的形式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出席并讲话。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胡革平、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十月》执行主编李亚妮,以及梁鸿鹰、彭学明、李朝全、胡平、孟繁华、贺绍俊、白烨、张燕玲、刘琼、陈汉萍、宋强、王国平、宋嵩、舒晋瑜、舒文治等主办方代表和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主持。

李敬泽表示,《坪上村传》是一部有独特魅力、值得深入探讨的作品,也是一部耐读的、耐人寻味的书。它书写了一个村庄几十年的记忆和历程,但不只是将其放在传统的农耕文明与现代性的架构中,更重要的是放在了脱贫攻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个巨大变革的背景之中。作为小说,《坪上村传》为一个村庄立传,整体上具有虚构品格,但同时也有非虚构的品格。作者的在场让读者能够强烈感受到这个村庄不仅只是被回望着的,也是在进行中的、是“敞着口”的。这是一部面向过去、也面向现在和面向未来的作品,它启示我们要在历史与现实变化的动态过程中认识乡村,同时也要通过我们的书写,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在已经逝去的与我们活生生正在展开的生活之间建立起深刻的情感和伦理关系。

胡革平认为,《坪上村传》凝聚了新农村新气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在今与昔、变与不变的纠缠中串起了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乡土文明,这是一方土地的自信和坚守。

专家研讨彭东明长篇小说《坪上村传》

《坪上村传》首发于《十月》2018年第6期,单行本由作家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作者在外漂泊38年后重返故乡,从尝试重建村庄一砖一瓦一泥开始,以传记的方式书写村庄的人与事,生动描写了坪上村近百年的变迁和发展历史,折射出中国乡村社会近4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进步。会上,张亚丽和季亚妮分别介绍了《坪上村传》的出版情况和发表过程。在她们看来,这是一部具有经典性和人文性的乡土小说,也是一部厚重的富有思辨精神的村庄家谱。这部书写乡村振兴题材的长篇小说,与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不谋而合,是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一个缩影。

与会专家认为,作者绘制了一部现代乡土的人物图谱,由此可见坪上村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触摸到鲜活的、与农事直接相关的村庄生活和民俗,映照出传统村庄的蓬勃生机,这幅南方乡村风情画富有现实中国的时代性和当下性。同时,该书是一部文学化的村史村志,从回望的角度写出了一个个历史长度里的村庄变化,对村庄、家庭和具体人的大小变化把握,见证了时代的客观变迁,写出了乡土元气,呈现出村庄历史性和共识性的全景,为当下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与资源。

谈及创作缘起,彭东明说,自己重返家乡后,用5年时间将一栋200多年历史的老屋修缮成一座书院,又花3年时间写成了《坪上村传》。是这片土地上的百年变迁给了自己写作的勇气,小说的每一句话都只有在这片土地上才能生长出来。这一方土地上千百年来积聚的力量,简而言之是一座村庄的力量,大而言之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力量,它将生生不息,永远滋养着自己。

(康春华)

这种文学以不同寻常的精锐的眼力刺透了人性深层的幽暗,总能让人耳目一新。这也许就是当代那些接受能力强而又倍感饥渴的年轻人对残雪文学感兴趣的原因吧。至于这是否说明残雪的创作符合当下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个要看,只能说,她的作品符合当前最能思考也最愿意做精神上的深层次思考的人的需求。这样的人显然不可能很多,通常都是一些年轻的阅读爱好者,他们渴望在纯文学中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新视野和新维度。

任雯:残雪的新长篇《激情世界》您读了吗?对这部作品的理解是否可以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经验的世界,另一个是意志的世界,这样理解对吗?残雪将这两个世界的界限模糊了,导致了读者可能无法找到一种合理的位置去阅读,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邓晓芒:刚刚读完。我的第一感觉是,这部小说和残雪以前的作品好像不同,接近于传统现实主义的风格,几乎没有读不懂的地方;但熟悉残雪作品的人不会为这些表面的日常叙述所迷惑,而去发现其中所隐藏的“反常”之处。例如,尽管书中每个人物或每对恋人的爱情生活都各不相同,但你仔细品味,会觉得每个人物性格大体上有一种“雷同”。小桑、小麻、寒马、雀子和后期的悦、黑石、费、仪叔、晓越和李海,都不能用现实主义的典型性格来评价。或者说,作者的意图并不在于刻画人物性格,她的主题是人物通过文学而通达灵魂中的相通之处。打个比方,这里的主题不像绘画,倒是更接近于音乐,这些人如同同一首乐曲中互相呼应和共鸣的音符,每一对恋人就像是乐句中的一问一答,最后总合为一场多声部的合唱,整个贯通的旋律则奔向一个被反复加强的主题,这就是真正的文学对人的灵魂的拯救。因此,“鸽子”书吧其实是一个理想化了的群体,他们的内心从上帝视角看也许是透明的,这极其真切地触动了读者以他们自居的体验冲动和身历其境的亲身感悟;然而实际上,这些心理活动的内在韵律又像看不透的“网”一样无形中支配着他们,使他们的每一次决心或行动都像是一场冒险。如同黑石说的:“为什么不投入进去?要有一行动,才能真正懂得自己的那颗心啊。”从这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爱情的描写都不是就事论事地反映当代青年的现实风貌,而是合起来构成一个巨大的隐喻,象征着一个由“激情”构成的“世界”。换言之,书中的激情就是精神创造的象征,文学和诗性的语言实践在对恋人的抚摩、亲吻中获得动力,打穿了人际之间的隔膜,使动物性的行为本身成为了精神性和人文性的,实现着人与人在灵魂最深处的沟通。残雪说,“新经典主义”的最高哲学就是精神和物质的同一性,但这种同一只有放在文学实验中才能展示出来,因为在文学中就像在热恋中一样,两个人成一个人。全人类在终极的意义也就是“一个人”,只要有文学的眼光,我们在他人身上看到的都是“自己”。所以在小说中,我们很难截然区分出哪些是现实的情感冲突,哪些是超现实的奇思妙想。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本身都具有身体性或肉身性,就是和性生活一样的感性活动和肉体活动。残雪的这部最新小说是她整个创作生涯一直在追求的目标的最精彩的体现,即要让物质本身以其最原始的形态直接体现出人的最高级的精神。

任雯:残雪曾说:“因为我的方法和其他作家都不同,我很谦虚,很努力地想去理解、认识西方文化,并且将其很好地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老老实实地做了几十年的工作。觉得把我作为中国人的优势在西方发挥出来了,所以他们觉得我的作品很新奇。”这里的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优势是指哪一方面?

邓晓芒:残雪这里说的“中国人的优势”,我理解并不是指中国人天然的优势,而是指中国人在现代生活中由于融合了西方文化而展示出来的“杂交优势”。例如说现代汉语,这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或“白话文运动”以来好几代中国作家和翻译家千辛万苦经营起来的。现代汉语吸收了西方的语法、逻辑和标点符号之后,就把自身的那些以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尽可能多地表达出来了,而这些中国元素在西方本来是闻所未闻的。现在不但西方人感到惊奇,就是中国的评论家也都觉得匪夷所思,已经有人指出,虽然残雪的文字极其朴实、简练和干净,甚至从来不用生僻难认的字,但其表达的意思却是那么惊世骇俗。残雪通过创造性的文学实践而把暗示变成了某种可辨别的结构、图案,或某种令人闻之起栗的旋律。《易经》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残雪则是把这个“象”也以现代汉语的“言”的方式构造出来了,她是“以言立象”。

任雯:残雪曾说:“因为我的方法和其他作家都不同,我很谦虚,很努力地想去理解、认识西方文化,并且将其很好地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老老实实地做了几十年的工作。觉得把我作为中国人的优势在西方发挥出来了,所以他们觉得我的作品很新奇。”这里的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优势是指哪一方面?

邓晓芒:残雪这里说的“中国人的优势”,我理解并不是指中国人天然的优势,而是指中国人在现代生活中由于融合了西方文化而展示出来的“杂交优势”。例如说现代汉语,这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或“白话文运动”以来好几代中国作家和翻译家千辛万苦经营起来的。现代汉语吸收了西方的语法、逻辑和标点符号之后,就把自身的那些以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尽可能多地表达出来了,而这些中国元素在西方本来是闻所未闻的。现在不但西方人感到惊奇,就是中国的评论家也都觉得匪夷所思,已经有人指出,虽然残雪的文字极其朴实、简练和干净,甚至从来不用生僻难认的字,但其表达的意思却是那么惊世骇俗。残雪通过创造性的文学实践而把暗示变成了某种可辨别的结构、图案,或某种令人闻之起栗的旋律。《易经》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残雪则是把这个“象”也以现代汉语的“言”的方式构造出来了,她是“以言立象”。

■ 评论

马伯庸以其《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等作品,丰富了小说创作手法的叙事时间、叙事速度、细节密度等。《大医·破晓篇》更是以其对宏大历史的叙写、真实而精准的细节把握、个体生命的主体性介入与担当,为当下小说创作的方法提供了启发。

在小说中,马伯庸对上海华山医院院史、上海《申报》、清末民初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历史资料和近代医疗史等大量专业文献,进行了“扫荡”般的阅读与考古般的论证,进而对这半个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以及其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思考。进入小说文学创作时,马伯庸对历史过程中的人,历史事件中人的能动性、主体性进行总体性的把握与构思。《大医·破晓篇》的故事,主要集中在1904至1911年的上海、关东、皖北和英国伦敦。而待出版的《大医·日出篇》,会将故事从北洋军阀时代一直延展到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通过一群卷入20世纪上半叶动乱时局的医生,通过这些医务工作者的视角和主体性介入,去充满激情地回望近代中国最苦难、最艰辛的“大历史”,书写中国人民波澜壮阔而又震撼人心的抗争史。

作家将小说的三个主人公设定为三种不同出身与经历:方三响,是日俄战争造成的关东某山村全村几近覆灭后的孤儿,接受红十字会的资助,成为“定向培养生”;孙希是一个被外父官收养的孩子,在欧美游历长大后,回国来到红十字会医院工作;姚英子则是上海巨富之家的独生女。三种不同的身份高度浓缩了红十字会医院第一代医生的三种背景。不同的家庭出身与人生经历,造就了不同的世界观与生活习惯,但是,他们也都是“少年中国”之形象代表。随着宏大历史的徐徐展开,他们都以强烈的主体性意识介入历史事件之中,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彰显出“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的时代之子形象。《大医·破晓篇》把年代列为每个章节的标题,按照时间的有序进程,大开大阖地对宏大历史的具体进程进行高密度、高强度的叙写。第一章“一九〇四年七月”展现了三个不同空间的少年遭遇,在一个全知视角下进行总体观照,不仅渲染了人类“天涯共此时”的命运维系感,而且显示出历史进入20世纪后,包括医学在内的种种技术进步,正在改变着人对时间、空间的感知,改变着人的生命与时空的关系,改变着人与人的联结方式。他们在历史现场中的角色、在不同事件之间的牵连,都让我们看到了宏大历史的肌理纹理,看到了全球视野下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宏大的历史要让人感受到真实生动,必须要对当时的日常生活与生活细节进行描绘,必须要对当时的社会形态与社会观念进行呈现。只有通过历史缝隙深处的具体细节进行细致的描摹,才能让读者感到历史的温度、时代的真实感和事件的现场感。《大医·破晓篇》中,作家在充分尊重历史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文学想象与细致入微的文学描摹,创造了情节的张力、故事的意义与崭新的人物形象。此外,马伯庸给他小说中的人物注入了强烈的主动性和总体性,让他们主动介入历史过程,担当起了各自的任务和使命,从而让人物之间碰撞出思想交锋与火花,凸显了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方三响的粗犷、勇猛、热情与胆识,孙希的雅致、细心、犹疑与诚恳,姚英子的泼辣、大方、细腻与敏感,大记者农跃麟的大胆而又充满激情、自由而又充满独立意识的性格,青帮老大刘福彪的自命不凡与包容大度,法租界巡捕史文森的精明、敏锐、利索与老道,以及姚家管事陶管家的机敏、周详……都合情合理地融入历史的进程与种种大事件中得以展现,在日常生活的各种微观冲突中得到细致的呈现。

小说通过这些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终于充分展现了这些人物的潜在主动性与总体性,让我们从场面冲突的缝隙里发现并展示出历史进程中的某些重要事件。正如小说中那个充满历史睿智的大记者农跃麟所说:“如今这个时局,最大的慈善,莫过于拯救吾国之命运;最高明的医术,莫过于拯救吾民之灵魂。”尽管历史的过程是幽深而曲折的,但是,在不同的个体生命的际遇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刻录重要的历史印痕。由于个体生命鲜活地主动介入,各种历史场景与历史细节的迅速激活,成为生动形象的、充满激情与理想的文学细节,吸引和感染着无数的人们。由此,我们得以思考个体生命史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真切、贴肤的内在关联。

此外,马伯庸给他小说中的人物注入了强烈的主动性和总体性,让他们主动介入历史过程,担当起了各自的任务和使命,从而让人物之间碰撞出思想交锋与火花,凸显了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方三响的粗犷、勇猛、热情与胆识,孙希的雅致、细心、犹疑与诚恳,姚英子的泼辣、大方、细腻与敏感,大记者农跃麟的大胆而又充满激情、自由而又充满独立意识的性格,青帮老大刘福彪的自命不凡与包容大度,法租界巡捕史文森的精明、敏锐、利索与老道,以及姚家管事陶管家的机敏、周详……都合情合理地融入历史的进程与种种大事件中得以展现,在日常生活的各种微观冲突中得到细致的呈现。

小说通过这些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终于充分展现了这些人物的潜在主动性与总体性,让我们从场面冲突的缝隙里发现并展示出历史进程中的某些重要事件。正如小说中那个充满历史睿智的大记者农跃麟所说:“如今这个时局,最大的慈善,莫过于拯救吾国之命运;最高明的医术,莫过于拯救吾民之灵魂。”尽管历史的过程是幽深而曲折的,但是,在不同的个体生命的际遇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刻录重要的历史印痕。由于个体生命鲜活地主动介入,各种历史场景与历史细节的迅速激活,成为生动形象的、充满激情与理想的文学细节,吸引和感染着无数的人们。由此,我们得以思考个体生命史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真切、贴肤的内在关联。



宏大、细小与个体

——读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马明高

作家出版社2022年度好书揭晓

本报讯 为展示作家出版社2022年度优秀图书作品,弘扬精品出版,为读者推荐有价值的好书,1月18日,作家出版社2022年度好书专家评选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国作协副主席、本届评委会主任阎明宏,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路英勇出席评选会。本届评委会由文学评论家、文学期刊主编、影视界专业人士组成。评选会由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顾慧主持。

吴义勤在讲话中说,作为由中国作协主管的国家级大型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近年来通过多种举措持续推出优质图书,活跃读者市场,丰富阅读生态。其年度好书评选日益受到关注,影响力持续增强,不仅注重文学质量出版,同时为作家和作品打造输出平台,建立作者、作品、出版社、读者四位一体有效联动。近年来中国作协拓展与影视行业相关合作,实现新时代文学与影视双向赋能,此次评选年度最具影视改编价值图书,也是为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输送优质资源,助推文学事业融入现代传播新格局。

在作家出版社2022年度出版的近500种图书中,经两轮投票筛选,最终36部作品入围终审。施战军着重对入选作品进行了总体概括与点评。他表示,入围图书既有知名作家的沉淀之作,也有新锐作家的先锋书写;既有驻足时代发展的宏阔图景,也有探寻精神世界的心灵哲思。它们在历史与当代、虚构与纪实、人物与内心的多元维度下构成了独特的文学生态,同时彰显了2022年作家出版社在文学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会上,阎明宏介绍了此次评选的目的,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介绍了终审图书情况,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松介绍了投票规则。评委会一致认为,此次入选的36部图书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立意深刻,能够作为2022年度作家出版社所推出作品中的优质代表。经评委会讨论与商议,最终评选出作家出版社2022年度好书20部:冯骥才《多瑙河峡谷》、老藤《铜行里》、周晓枫《小门牙》、关仁山《白洋淀上》、葛志军《雪山大地》、厚圃《拖神》、罗伟章《下庄村的道路》、《新编新译世界文学经典文库》、梁晓声《中文桃李》、黄德海《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房伟《小陶然》、王蒙《从前的初恋》、李彦《兰台遗

卷》、董香结《日冕》、周梅森《大博弈》、《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小说精选集》、杨典《恋人与铁》、刘索拉《浪迹生涯:刘索拉与朋友们》、叶辛《婚殇》、孙甘露《时间玩偶》。其中,《白洋淀上》与《雪山大地》两部长篇小说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首批出版作品。

会上,影视界专家还特别对有影视改编潜力的题材和作品进行了探讨。最终,评委会共同评选出作家出版社2022年度最具影视改编价值图书10部:厚圃《拖神》、关仁山《白洋淀上》、晓雪《警卫》、梁晓声《中文桃李》、老藤《铜行里》、余耕《做局人》、叶辛《婚殇》、陈祥《漂白》、郑彦英《凌云》、周晓枫《小门牙》。路英勇表示,作家出版社将持续优化选题结构,珍惜“作家”品牌,加大精品图书扶持,在寻找优质选题的同时,不断开拓文学市场,探索出版的新边界和新形式,为读者奉献更多精品好书,为新时代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李一鸣、何向阳、彭学明、梁鸿鹰、程绍武、李少君、徐坤、刘琼、贺绍俊、杨桂峰、舒晋瑜、陈海等文学界专家,张玲、胡智峰、郭靖宇、刘芳等影视界专家参加评选会。(周 茉)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LITERATURE SUMMIT PLAN FOR A NEW ERA